

1925



1997.9

潮州文史資料

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

潮州文史资料

第17辑

(内部资料)

政协潮州市委员会文史编辑组编

1997.9.

目

录

潮州文史资料

第 17 辑

· 峥嵘岁月 ·

三十五载人生曲

- 一个文化人的自白（上） 陈俊彝（1）
潮州枫溪陶瓷展馆忆述 吴为明（60）

· 人物述林 ·

- 我所认识的饶宗颐教授 詹伯慧（65）
画家·志士
——记潮籍旅新名画家、美术教育家张汝器
..... 陈贤武（73）

· 文化史谭 ·

- 故土掇瑗（二） 叶天津（79）
潮州歌册及其刻印书铺概况 石遇瑞（86）

· 名城史话 ·

- 桑浦山揽胜 陈传伍（92）

往事寻踪

- 潮州在中法战争中的两件事 王 槐 (100)
- 黄埔军校潮州分校 陈贤武 (102)
- 潮州城锣鼓馆点滴谈 兆 声 (114)

社团之页

- 民建会在潮州的地方组织侧记 许振声 (122)

梨园掌故

- 潮州梨园漫记 (一) 刘管耀 (142)

侨林胜览

- 国际潮团联谊年会史略 郑仁章 谢昭强 整理 (174)

纪念“七·七”抗战60周年

- 潮汕沦陷回忆录 蔡子翔 (189)
- 日寇“三光”龙翔寨 石遇瑞 (200)
- 抗日歌谣选 贤武 辑 (203)

文 摘

- 略谈解放前文官的官阶 (173)

三十五载人生曲

——一个文化人的自白

陈俊彝

内容提要：

一、踏上文化路

- ▲创建潮安文工团
- ▲涉足舞台
- ▲《赤叶河》的挫折
- ▲到南澳拍电影
- ▲与指导员共事
- ▲“短命”的戏剧院
- ▲住院
- ▲家庭矛盾
- ▲写信给周总理
- ▲在大坑农场的日子
- ▲《春雷》难响
- ▲再见，歌舞团

二、陷入戏曲泥坑

- ▲不当局长做“戏仔”
- ▲落实艺人政策
- ▲丑戏、旦戏会演
- ▲《八仙闹海》起风波
- ▲停演古装戏
- ▲吃饭和卫生纸
- ▲妹妹死了
- ▲排“专员戏”
- ▲“小四清”和《赤岭风云》
- ▲首次参加省会演

▲“何苦”

▲中南区现代戏会演

▲并团与分队

▲“黑尖子”

▲岩石集训

▲学习焦裕禄

三、在“浩劫”中磨炼

▲教育学院里的革命

▲“文艺黑线”头目

▲猪场劳动

▲祸不单行

▲“滚下舞台”

▲特务案的牵连

▲武斗

▲清理阶级队伍

▲“五七”干校

▲“五好”社员

▲“赤竹坪”水库

▲重返干校

▲“浩劫”磨炼的收获

引 子

“陈局长，你怎么做戏了？”

“当局长和做戏，都是为人民服务。”

这是1960年潮安文工团（后改名潮州实验歌舞团）首次在刚落成的潮州影剧院（现潮州电影院）演出歌剧《洪湖赤卫队》后在街上遇到熟悉的工人的一次对话。我是该剧的导演，并扮演了狗腿子老么。

“老陈，我们看来是路走对，门人错了！”

“入哪个门还能由自己决定吗？”

这是“文革”期间在“一小撮同类”中的偷偷议论，因为那时的文化大革命是首先革文化的命，是先从文化开刀的。

“陈局，你如果现在仍在工业就好了！”

“那也不见得，也许会更糟。”

这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后，在文化局的一次闲谈。比较文化这座“清水衙门”，人们羡慕经济部门，有钱，受重视。

1992年我开始退下二线，在一次拜访秦昌大副书记时（那时他已调任潮安县委书记），他对我说：“大家公认你比较像个文化人。”

“像个文化人”，这是给我很高的评价。说实在，我还不能算个文化人，虽有点文化，也能说会写，但充其量只能算是文化的“万金油”。我从事文化的各个部门，从专业艺术、社会文化到文化企业，但毕竟没有一门精通，只不过是文化中“浸”得久，尝尽了其中的酸甜苦辣，有痛苦，也有欢乐。

一、踏上文化之路

1958年8月，潮安县和潮州市合并，那时我在潮州市工业局工作，虽是25岁，也已当了3年的副局长，并在创立潮州的工业基础方面，工作正处于“旺势”。

县市工业局合并后，筹备建立潮安县人民公社联社工交部，我们这些副局长都准备安排当科长，那时我分工负责重工业。

某天，组织部通知我去报到。

“组织决定调你去建立潮安文工团，担任团长。这是田荣申书记点名的，你回去准备办理移交手续。”

那时的调动工作并不像现在可以讨价还价，何况我自知我是机关中文娱活动的骨干分子（在潮州市曾担任较长一段时间的共青团机关总支副书记）。

我向局领导作汇报，并准备移交。这时，主管工业的副书记

钟前从省里开会回来，找我研究工作。我告诉他，组织已决定调我去潮安文工团。

“我怎么不知道？此次省的会议决定工业干部不要随便调动。”他有点惊讶，叫我暂慢去报到，候他再与田书记商量。

于是，我继续抓我的“重工业”。

大概至12月，有一天，钟前副书记找我，“没办法，是田书记指名要你去，他说找不到更适合的人选。”

就这样，我带着介绍信向文教部文化科杨联华科长报到，踏入了文化的大门。

创建潮安文工团

潮安文工团是大跃进的产物，在此之前，潮安县已拥有正天香潮剧团、稻香潮剧团、潮州汉剧团、潮州杂技团等四个专业艺术团体。

在我到任之前，文工团已在进行筹备，由来自文化馆的孙弘，潮安一中的陈玛原、傅求业，高级中学的李开舫和原在一中学生歌舞团，毕业后考入北京天马舞蹈工作室的施策（因病回家疗养）等人负责。他们中除陈玛原早在学生时期已闻其名外，其他人我都不认识。他们中除傅老师后调回一中外，组成了文工团的编导班子。

在办团之初，还有在家养病的战士歌舞团吴云参予协助。

文工团的成员一方面是从文艺会演中挑选，一方面公开招考。挑选的人员主要是一中、高级中学和韩师三个学校的业余文艺团体的成员，以一中为主。

对于挑选人员，我一无所知，相信他们的提名，主要参加招考。

根据县委决定，文工团的人员都是干部编制，因此在确定名单之后，由我到组织部开“调令”，然后到各学校调人。当时组织部的林庭皆、林益盛二位都热情给予帮助，各校的人事干部也

很支持，这大概也是开始建团时我所能发挥作用的一件工作。

在招考和调人中，有几个人给我留下印象：

有一天，枫溪中学的老师带了一个学生来考，他一只手跌伤，还带着绷带。他有很亮的嗓子，会打快板，人很朴实。据老师介绍，他是学校一位品学兼优的宣传骨干，出身好。尽管他的业务不算很好，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，我还是决定吸收。他就是后来任过文工团、汉剧团的秘书，潮剧团团长，市侨联主席的谢昭强。

在招考舞蹈演员时，发现有一个长着褐色皮肤、两眼黑溜溜的小姑娘，腼腆地在一旁观看。我们鼓励她试一试，发现她的腰腿和身段都很好，于是就吸收。她就是后来成为汉剧团的名演员、曾担任潮安文宣队副队长，现在揭阳市文化部门工作的陈贤卿，绰号“乌妹”。

黄盛典，在韩师提前毕业后留校于马列教研室工作，他有着宏亮的嗓子，唱潮剧，因此还是动员他应召。来团几个月后就调去潮剧团，成为潮剧的著名老生，现任广东潮剧团一团副团长。

人员调集之后，分为音乐、舞蹈、演唱三个队和编导组，任命了队长和组长。2月1日，在西马路的城中堂旧址（现湘桥区医院），文工团宣告正式成立。

解放初，我曾羡慕潮汕饶艺宣队、潮汕文工团和部队文工团，想不到今天我居然当上了这样一个新文艺团体的团长，那时我是26岁。

涉足舞台

对于舞台，我并不陌生。早在越南读小学时，就是学校的合唱队队员；初中时参加了话剧、歌剧的演出，虽是懵懵懂懂，但毕竟是踏过舞台。

此后，从高中到部队、机关，也曾多次上台演出。但是，这

一切都是业余活动，没有负担，所谓“不懂不惊”。

文工团开始排练节目以后，除原有从学校挑选部分节目外，也排了小话剧、小潮剧，并到凤凰山区（水电站工地）演出。

那时，提倡干部走又红又专的道路，做“红色专家”。在工业局时，我还算是这方面的典型。因此，到文工团后，也是雄心勃勃，我相信没有什么学不会的。在编导组的鼓励下，我在话剧《李有国》（《万水千山》选场）中担任主角红军教导员李有国。

尽管我有部队的生活经历和瘦削的外形条件，对人物的感情也稍能理解，但毕竟缺乏气质和舞台实践经验，活动很拘谨，演出效果并不很好，但这一不成功的演出却促使我努力学习。于是，我开始读斯丹尼拉夫斯基的《导演学基础》等著作，读焦菊隐的有关论述，读有关介绍布莱希特体系的文章，并学写诗、作曲、乐器，参加练形体基本功，我决心要探索舞台艺术的奥秘，并把导演作为自己“专”的路子。

在文工团工作期间，我先后导演了话剧《活捉罗根元》、歌剧《珍珠墙》、《三月三》、《洪湖赤卫队》等，每当演出，我深深品尝到创作成果的甘甜，尽管现在看来这些都很不成熟，而且其中也有对兄弟剧团演出的借鉴，但都是我走上艺术之路的成果。在导演《洪》剧时，由于剧本有些唱段没有配曲，我就根据人物的主旋律给予配上，真有点“胆大包天”。

我经常参加演出，但我深知自己的业务条件，演出只是作为一种探索舞台实践的手段。因此，我扮演较多的是狗腿、群众之类角色，只是在担任主角的指导员田在珍调珠影之后，在“癞哥寮选壮丁”的情况下，扮演了《三月三》的主角侦察队长周洪亮和《洪湖赤卫队》的主角赤卫队长刘闯，这方面还幸亏有李开舫老师为我化装加工。

参加舞台实践是我从事专业艺术团体工作时一直坚持的宗旨，从文工团开始一直到1975年潮安文宣队到南澳岛慰问的最

后“告别演出”，从未中断。

《赤叶河》的挫折

《赤叶河》是解放初期在潮汕一带很有影响的方言歌剧，是潮汕文工团为了配合土地改革，为探索潮州方言歌剧这一艺术形式而创作演出的。由于揭露了地主阶级的残暴，而且用方言，因此在农村演出获得很好的效果。

陈玛原是这部歌剧的主要编导，尤其在改编剧本和作曲上，表现出一个潮州方言歌倡导者所特具的艺术风格。因此，当文工团准备尝试到戏院作巡回商业演出时，我们决定重新排练这个戏。

由于时间匆促和剧本改动的关系，加上我当时认为主要为配合阶级教育，因此决定先排前大半部（即贫农老旺一家被害，阿英跳河，阿标出走）而没有排解放的二场戏。

在彩排以后，由于该戏情节动人，很多演员都被感动得流泪，因此尽管有人提出这样处理是否恰当，但谁也没有去考虑后果。

揭阳曲溪的首场演出，当晚就有人在戏院门口贴了大字报，借问剧团为何不演后段戏，于是，不得不在此后演出中作说明，但人们仍有所议论。实践的教训，使我们在回潮州后又再补排后段戏。

这是我到文化部门后的第一次挫折。

没想到这一挫折却成了“文革”期间我的“罪证”，说我是“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，有意不排斗地主的戏”。在“效果是检验动机的标准”的帽子下，尽管我再三辩解，但人们能否相信呢？

到南澳拍电影

1959年8月，我们正在揭阳县城演出，有一天，“八一”电影制片厂《英雄岛》摄制组的剧务主任明宣来戏院找我，他说县委已同意全团开赴南澳协助拍电影。于是，我们只好暂时结束巡回演出。

《英雄岛》是“八一”电影制片厂作为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片，是一部当时还少有的彩色故事片，外景地主要是南澳岛，我们的任务是扮演群众角色。

拍电影在当时还是一件很神秘的事，我们谁都没有经历过，因此大家情绪都很高。在从汕头赴南澳的猎潜艇上，到处是歌声，大家还参观了艇上的设备，可是，当驶出妈屿口时，风浪的颠簸，使大部分人都呕吐，我和极少的几人坐在指挥台上，勉强没有被传染。由于当时是全军办电影，因此我们被安置住在营房。

执导《英雄岛》的是老导演冯一夫，副导演是史进，演员中有我们在银幕见过面的里坡、杨静、陶玉玲和《英雄虎胆》中那个“独眼龙”，他们都是校官和尉官。尤其是陶玉玲，《柳堡的故事》中那个二妹子给人留下很好的印象。因此在当晚联欢时，我们就欢迎她唱《九九艳阳天》，殊不知她说：“对不起，我是话剧演员，不会唱歌”。我们都不信，在一再要求下，她才轻声地哼起《九九艳阳天》，至此，我们才知道电影中出现的歌声是别人唱的。

此后，在拍摄战火下坚持生产的场面时，我们也经历此一情况。歌曲是由总政歌舞团先录制的，我们当然也要学唱，当拍摄时，喇叭播放着事先录制的合唱曲，我们边劳动边跟着唱，这样，当放映时，人们也以为我们的合唱水平相当高。

电影演员经常说，拍电影是“磨性子”，一点也不假。全片我们只占三十多个镜头，却在南澳住了一个月。由于该片是彩色，因此碰上阴天就不能开拍，有时一早到海边外景地，等了几个钟头，太阳还是没有露面，只好“收兵回营”。

拍战火下坚持生产的那场戏，从下午五点多至隔天天亮，总共只拍了十六个镜头，但场面的准备却要花费很多时间：要同时开动几部探照灯；火焰兵向海面喷火；事先装置的房屋要点火，广播播出歌曲，群众在火光中劳动，场面颇为壮观。

为了不浪费时间，我们在拍摄间隙赶排庆祝建国十周年的献礼节目，那时叫“放卫星”；还请拍摄组一位曾从事舞蹈的赵同志到团指导训练，因此生活是颇为紧张，也充满乐趣，特别是与制片厂的人员建立了很好的友谊。

我们主要是扮演海岛民兵，除坚持生产的场面外，还有向前线送弹药，在海边放宣传品等镜头。我没有参加拍摄，因为导演要让我当一个被国民党派遣登陆的“水鬼队”的小头目。可惜因县委通知回县参加十周年的庆祝活动，失去了一次上镜头的机会。

与指导员共事

文工团成立不久，组织就派了田在珍担任指导员。他原是文化用品公司的经理，我在市委工作时就认识他，开始介绍信中写的是担任副指导员，但他经过“交涉”，改为指导员。我们都是正职，照“规矩”他是党支部书记。

在文艺团体设指导员是根据部队建设的经验，意在加强党的领导。但往往是指指导员就是代表党的领导，无形中成为第一把手，这就产生了党政领导的矛盾，此问题一直困扰着各文艺团体。

田在珍是部队转业的地方干部，在部队是业余文艺骨干，是很好的男高音，但缺乏表演的基础。我虽是本地干部，也算是部队转业，因此相互之间可以共事，也比较容易取得谅解。尤其是在我导演的一些歌剧（普通话）中他担任主角，都能很好地配合。

我们第一次发生矛盾是在关于演出节目的安排上，当时他对安排提出意见，其中包含对个别节目的看法。但我坚持我的意见，于是发生争论，最终仍是以我和编导的安排不改变。此后，随着各种政治运动的开展，在对待编导人员和个别演员上也出现矛盾。他喜欢采取一些偏激的做法，而我却反对，于是他认为我

的思想右倾。这在当时“左”潮泛滥的条件下是很“危险”的，但我并不在意，而他也并不像某些人那样向上打“小报告”，这也是他值得信赖和共事的地方。

矛盾最激烈是在他的妻子调到文工团工作以后。她也是一位业余文艺活动分子，但由于年纪较大（已有三个孩子），基础较差，因此在舞蹈队安排角色上多演一般配角，这就引起他的怀疑，认为我是有意给他难看。曾经在一次支部会上为此发生激烈的争论，弄得二位新党员不知所措。

我对于这一切并不介意，因为那时我所考虑的是如何办好这个团。对于他生活上的困难，我也多方予以关心。他终于从我的行动中解除了怀疑，坦诚地找我交谈，承认他的缺点。

至今，我们仍是很好的朋友。

当然，在以后到潮剧团工作时，我也当了指导员；而在文宣队当队长时，组织又派来了指导员，幸好不久就走了。看来，指导员的制度在文艺团体并非行之有效，其中也有个人的作风问题。

“短命”的戏剧院

潮安县共有五个专业艺术团体，1960年下半年又成立了戏曲艺术学校（对外挂韩山师范附小的牌子），这在全国是较少有的，正如“八一”电影制片厂演员维佳（他是维吾尔族，常扮演美国顾问之类角色，当时带了《英雄岛》的影片来县慰问）所说的：“我们走遍全国很多地方，就算潮安和泉州两个地方剧团最多。”

为了加强领导，1959年底，县委决定建立戏剧院，统一管理专业戏剧团体，并由文教部长姜尚夫兼任院长，我任副院长（仍兼任文工团团长），下设美术和编剧二个组，由各团专业人员组成，并调许统林任秘书（戏剧院撤销后他调文化局，仍任秘

书)。

对于戏剧院的工作，我并不熟悉，尽管我努力协调与各团的关系，但事实有点多此一举。特别是剧本的确定、修改和舞美设计，往往都要经过各团领导的同意，因此有时也出现一些矛盾，尤其是和正天香潮剧团的指导员林继杰，在剧目生产上不时出现分歧，更何况我的精力又要兼顾文工团，因此对此机构的作用就有所非议。

当选举文教总支委员时，更促使我对此机构的存在失去信心。

为了有利于统一领导，在选举总支委员时，我的老朋友、文化局副局长吴士衡建议由我作为总支委候选人。但在选举时，总支一个姓王的专职女干部提出我的家庭成份和社会关系问题，这在当时是很重要的。尽管我的家庭早在1955年已改为华侨工人，我的社会关系在入党、肃反时已作了审查，但我不作辩解，从“反右”斗争以后，我就知道自己是什么“料子”。终于，我没有选上，还是由吴士衡担任。由此，我也更了解我在政治上没有什么“前景”，更坚定我在艺术上钻下去，努力成为“艺术干部”的信念。

在戏剧院任职期间，适逢地区组织专业艺术会演，于是我只好腾出一定精力，配合文化局组织各团参加，正天香潮剧团的《活捉孙富》也正是在此次打响，我为此写了一篇评介文章；而对于稻香潮剧团演出的《董槐会母》的非议，我也写了反驳的文章。这些在大会《简报》上发表，这也是我所能做的。

终于，戏剧院在建立近一年的时间后，因无所作为而告撤消，我仍当我的团长。

住 院

我努力学习、钻研业务，重点攻读苏联的斯氏体系，但翻译

的文字比较晦涩，而且很多术语也一时难于理解，但我还是硬着头皮学下去，并做了一些笔记。

我还得兼顾戏剧院和文工团的工作，日以继夜，休息时间逐步减少，加上有不少令人费神劳心的事，于是，在一次感冒后引发脑神经痛，经延医治疗无效，大家把我抬到县医院去。

我处于半昏迷，要靠止痛药止痛，每天要注射八、九次，屁股两边交替使用，但效果仍不大。负责主治的内科主任吴俊辉告诉我，准备采取神经封闭，如仍无效果，就要试验外地创用的在手掌埋线的方法。

神经封闭是以药物在额的中间和左右两侧从穴位注射，有点可怕，但也没有办法，我只好捱过去。幸好有效果，终于治愈出院。

此后，我留下了头痛的遗后症，只要过度疲劳或受刺激，老毛病就犯，这是我为了在文艺界能站住脚所取得的“成果”。

家庭矛盾

文工团基本是一支学生队伍，队员也多是不足二十岁的青年，他们都是第一次踏上社会。带好这支队伍，确实要花点心思，何况当时又处在政治运动不断的时期，轻易就上纲上线，加上我需要自学，因此就经常住在团里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而文艺团体的花边新闻又特别多，以致引发了家庭矛盾。

当我到文工团时，刚好第二个儿子诞生，长子也不过二周岁，幸好有岳母从上海来，帮助带管小孩。我因一心扑在团里的工作上，家里的事也就少管。

虽然人们说文艺团体是“是非之地”，尤其是男女关系，“常在河边站，那有不湿鞋”，但我自信坚持不贪污，不乱搞男女关系的原则，我不可能给这个洁白无瑕的新文艺团体沾上污秽。

可是，整天和一批男女青年生活在一起，又唱歌，又跳舞，

而且很多是妙龄、天姿的少女，很多人在注视着，特别是那些对我“另眼看待”的人。

随着业务的发展，逐步涌现了一些主要演员，作为团长和导演，无疑就会比较亲近些、关心些，由此，就出现了流言。于是，家庭也开始出现了矛盾，怀疑我爱有所迁。尽管我多方解释，但此一裂痕一直延续了几十年，也许至我离开人世后仍未能愈合，而我只能默默地忍受。

奇怪的是在“文革”期间，领导小组也对此问题进行调查，结果是不了了之。其实我自问清白，不管是男是女，我都以诚、以理、以情待人，作为一个侨生，在男女问题上，我既非拘谨保守，也不是毫无界限的胡作非为。

毕竟我为文艺事业付出了代价！

写信给周总理

大概在1960年的4、5月份，文工团为参加全省文化系统财务会议的全体成员作接待演出。当时省文化厅长陆向苍看完演出后大力肯定演出的水平，并提出了举办全省文工团会演的设想，大大鼓舞我们的进取心。

但是，我对当时全国严峻的形势知得很少，正当我仍充满信心地要把这个新生的艺术团体办好的时候，中央通知全国县一级文工团一律撤消。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我一时很难接受，除了耗费的心血外，毕竟我认为这种团体的生命力要比戏曲团体强，尤其是在当时服务政治、服务中心的特定条件下。

我百思不得其解。

我决定写信给周总理。

给中央领导人写信，可以追溯到我在工业局工作时。当时潮州研制成氧化钴，但无能力扩大生产。在传达中央政治局成都会议精神时，我看到当时任冶金工业部部长王鹤寿的发言中提到钴